

● 历史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政治认同问题分析

刘 芝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华人; 政治认同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澳大利亚华人基本上没有参政意识, 也就更不能形成政治认同了; 70 年代以后, 随着中澳建交, “白澳政策”的废除, 特别是华人自身知识素质和参政意识的提高, 澳大利亚华人的政治认同也在逐步的加深。文章系统阐述了 70 年代后在澳华人政治认同变化的表现, 力图对 70 年代前后在澳华人政治认同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中图分类号: D761.1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1)06-0061-03

一、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

认同(identity)在英文中指“身份”“个性”“特性”, 它的概念最早被运用于代数和逻辑学中,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转向心理学领域。在心理学中将认同作为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态度的行为, 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 可解释为认可赞同。简而言之, 认同是关于归属的问题, 是关于个体与一些人一致以及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问题, 它是一个“求同”与“存异”同时发生的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 它有着深刻、持久、根本的特性; 在政治领域中, 认同多被用来分析和解释政治行为的非工具性, 以及身份认同和集体认同对个人的影响; 因此, 认同具有多种形态, 如“自我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政治认同是其中一种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在研究政治认同的时候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认同的关联。

对于政治认同的内涵, 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概念, 即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 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 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 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 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本文将运用这些理论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华人政治认同做出分析, 梳理 70 年代以前华人移民政治认同的状况, 明确指出 70 年代后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 着重

分析认同转变的原因, 最终达到关于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政治认同研究明晰化的目的。

二、20 世纪 70 年代前在澳华人的政治认同状况

从澳大利亚方面来看, 早期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主要是从事采矿和淘金, 他们将澳大利亚视为发财致富之地, 因而“在商言商”, 对政治问题保持淡漠的态度, 不愿参与移居国的政治活动, 并且“白澳政策”的压制也使得华人参政成为无稽之谈。从华人本身来看, 早期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大多数出身于农村, 大多没读过书, 文化知识低下, 他们到澳大利亚也只是想赚点钱, 等钱赚够了就回家盖房养老, 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参政的意识, 更不用谈什么政治理想。

从中国方面来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口号是: 华侨应在政治上认同、经济上协助建设新中国。在那个时期, 我国的政策也不允许在政治上对移居国有所属。但事事无绝对, 出生于塔斯马尼亚的华裔政治家朱俊英就是个例外。他在 1913 年当选为联邦政府上议院议员, 还曾任副议长, 他在职期间建树颇多, 为促进中澳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被誉为是“全澳大利亚最干练最忠诚的立法政治家”。

总的来说 70 年代前华人的参政起步较晚, 政治认同意识也处于懵懂阶段。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推行和华人自身素质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家政策的号召。在 70 年代前移居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心中都对国家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不管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国家认同都是比较单一的, 绝大部分都只认同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但在二战后特别是 1972 年中澳建交, 身处澳大利亚的华人的

收稿日期: 2011-10-15

作者简介: 刘芝(1989-), 女,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与亚非、大洋洲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思想情感和政治理想才慢慢发生着变化。

三、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澳华人的政治认同状况

20 世纪 70 年代初,“白澳政策”被废止,澳大利亚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逐渐成长起来。新一代的移民不仅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还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享有澳大利亚公民的所有权利。随着澳大利亚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华人参政意识也苏醒了。澳大利亚的华人意识到,要维护华人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再受“白澳政策”时期排华的痛苦,就必须关心政治,必须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必须由“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叶归根”,以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去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同时享受到和当地人一样的福利待遇,更多地去争取澳大利亚政府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坐等着被赐予。并且澳大利亚实行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及多元文化政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人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正是这种关注度与参与度的提升促进了华人政治认同的积累。其主要表现在:

(一) 积极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在“白澳政策”废除以前,澳大利亚政府为限制华人入境颁布了一系列诸如《移民限制条例》等政策。在 1973 年,澳大利亚政府才公开声明其移民政策是“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并颁布了新移民法。这样,一批又一批华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虽然加入国籍不是国家认同的唯一标志,也谈不上在政治上认同澳大利亚政府,但这一举动从侧面也反映出华人对澳大利亚国家的些许认同感。不管华人入籍的动因有多复杂,一旦他入籍了,在法律上认同这个国家后,华人政治认同所涉及的情感也只需要时间和感情的慢慢培养。认同本来就有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由最初层次上本能的认同,如血缘认同、种族认同到法律上的认同,情感上的认同,最后才发展到政治理想上的认同。所以华人在 70 年代积极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也是其政治认同中的一步,最后是否每个华人都达到政治理想的认同这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最起码入籍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澳大利亚还是很有帮助的。

(二) 踊跃参政

踊跃参政是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政治认同的最集中表现。华人积极参与政治就意味着以及逐渐认同其政治理想。早在 1913 年朱俊英就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上议院议员,但像他这样的华人参政在当时只是极少数并不成代表性。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就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当选为国会议员、州议员、市长等重要职位的华人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曾筱龙是华人踊跃参政的杰出代表。他在 18 岁时自香港到澳大利亚读书,通过半工半读艰辛的努力先后获得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系学士学位和悉尼大学建筑系高级文凭,并成为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委员会成员。1991 年他作为工党党员被提名参加角逐悉尼市长和市议员的候选人,并在 9 月成功当选为悉尼市副市长,这是悉尼建市 150 多年来的第一位华裔副市长。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在参政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最令人骄傲的是,曾筱龙曾两次出席世界高峰会议,这让中国代表团都为之感到惊讶。

1990 年华裔青年刘威廉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当时

他年仅 25 岁,是澳大利亚联邦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也成为继朱俊英之后进入联邦议会当议员的第二位华人,连《每日镜报》都大加称赞他为“沉倦在老党中的新鲜血液”。

如果说曾筱龙、刘威廉为代表的一批华裔青年说明华人参政的深度,那么以沈慧霞女士为代表的华裔妇女进入政坛则反映了华人参政的广度。

沈慧霞在 1988 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当选为新南威尔士上议院议员,结束了新南威尔士议会中长期没有华人代表的历史。她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州议员,就连澳大利亚自由党人福·纪·奈尔也评价沈慧霞说:“有海伦(即沈慧霞)这样一个华人在议会中十分重要,她代表着那些华人和讲华语的亚裔人士的意见。她干得很棒,做到下情上达,其性情友善,勇于进取,令人赏识。”可见,新一代的移民在澳大利亚政府眼中已不是当初只会淘金、开餐馆、贩茶等传统行业的华人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愿意效忠的党派,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正是他们对澳大利亚形成了政治认同,他们赞同澳大利亚的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才会达到直接参政的效果。

通过这三位华人代表踊跃参政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 70 年代后,华人参政的人数逐渐增多,参政成员的构成也是多样化。如在参政的成员中既有青年,也有中老年;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律师、建筑师竞选也有商业家和学者步入政坛。另外,华人参政的层面也越来越广,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党派为政治依托,还有些力争得到华人群体的支持,但也不排除个人参政的可能。他们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提升了华人在主流社会的地位,刺激了更多地华人走向政坛并接受和认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政策等方面。因此,他们的参政成功的经验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华人关注和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逐渐形成对澳大利亚的政治认同,融入主流社会,维护作为公民应得的权利。

同时,在澳华人对澳大利亚的政治认同也有利于他们认同澳大利亚社会,参与政治事务。不管是高层次地投身竞选工作或是参与政府机构工作,还是低层次的参与竞选投票或当地社区行动,这些都是华人对澳大利亚社会负责的体现,有利于华人移民形成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认同。再进一步说,华人移民对移居国社会认同的结果也必然导致其主流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系列连锁反映。因此,华人参政作为在澳华人政治认同的集中表现,它本身不仅可以加深政治认同感,还能促进华人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

四、70 年代后华人移民政治认同变化的原因

(一) 内在原因: 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

自“白澳政策”废止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在人口数量、教育状况、职业构成、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的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转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简单的说就是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使得华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歧视。随着华人经济收入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已不满足只受人支配,自尊、人权意识日益加强。更多的华人为了保护华人群体的整体利益,争取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需要关心政治,需要建立自己的政

治认同,这也是70年代后华人积极参与政治的主要原因,再加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实行强制性的选民登记与投票制度,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澳大利亚华人对政治的关注和自我政治认同的形成。

(二) 外在原因: 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

70年代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出入境的限制,这就宣告华人可以自由地移民到澳大利亚。中国政府同时还鼓励在澳华人努力适应当地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别是鼓励华人积极参政,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澳国际交流和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二战后,中国政府“为了国外华侨的长远利益,便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有利于我国和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主动放弃了双重国籍原则。这就说明中国政府在鼓励华人加入移居国国籍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也正是入籍问题得到了解决,申请获得澳大利亚公民权的华人也在逐年增加。一般来说,华人在取得移居国的公民权之后其政治认同也会随之发生转变,从过去只认同于中国转变到也认同移居国。也就是说,华人在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后,其政治认同也从认同中国转变到认同澳大利亚。虽然说加入国籍并不能看做是国家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唯一标志,但是取得公民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华人已经慢慢的将自己的身心都向澳大利亚靠拢了。

(三) 华人移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5]赵海立. 政治认同解构: 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
- [2]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 [3]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4][6][7]庄炎林主编.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 [8][9][10][12][13]张秋生. 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M]. 世界民族, 2002.
- [11]彭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R]. 1980.
- [14]王德华. 澳大利亚: 从移民社会到现代社会[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 [15]梁英明.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
- [16]戈登·格林伍德. 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17]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 北京: 外语教研出版社, 1998.
- [18]骆介子. 澳大利亚建国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9]庄国土. 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J]. 当代亚太, 2003, 9.
- [20]石汉荣. 论海外侨胞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J]. 八桂侨刊, 2005, 5.

(责任编辑 董翔薇)

Analysis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since 1970s

LIU Zhi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Australian Chines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 Australian Chinese did not have the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political affairs and had no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efore 1970s. After tha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and the abolishment of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he new gener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with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ir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has increased.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s a long proces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and tries to give some convincing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